

## 書評論文

# 試評中國學者關於《太平經》的研究

黎志添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

### 導言：《太平經》研究的階段

從1935年湯用彤在《國學季刊》發表〈讀《太平經》書所見〉到現在，近代中國學者就現存《道藏》本《太平經》<sup>1</sup>的研究，已經超過一個甲子的歷史了。從這六十餘年的研究歷史，可以看到內中的困難、轉折、爭論、停滯和進步。

一方面，湯用彤和王明在開墾這方面的研究貢獻很大，並且確定後來中國學者在研究《太平經》與東漢晚期道教之間關係的重要方向；但另一方面，由於現存殘本的難解，研究者在解讀上處處遇到很大的困難。例如：王明就說過其「文詞鄙俚支蔓，文句蹇澀」；<sup>2</sup> 湯用彤也提過因為作者「不多引書卷，不多用典故」，因此「諸說極多，頗難一時檢查其出處」。<sup>3</sup> 不僅文詞與字意方面難解，經典本身的思想內容也是多樣和龐雜；在同一主題下，也有多層次甚至互相矛盾的記述。受著這些因為現存文本的客觀特性而構成研究上的困難與限制，中國學者在《太平經》研究的過程上可說是緩慢的，甚至有時停滯不前。<sup>4</sup>

一般而言，中國學者在總結六十餘年的《太平經》研究時，較多採取「階段時期」

<sup>1</sup> 本文以《太平經》為專指現存明正統《道藏》中的《太平經》殘本。

<sup>2</sup> 王明：〈論《太平經》的成書時代和作者〉，載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185。

<sup>3</sup> 湯用彤：〈讀《太平經》書所見〉，《國學季刊》第五卷（1935年），頁15，18。

<sup>4</sup> 除了經典解讀的困難外，道教研究在過去中國學者當中缺乏發展，也是使得《太平經》的研究未能有滿意的發展。

的分法。<sup>5</sup> 第一個時期是從1930年到四十年代，<sup>6</sup> 湯用彤和王明開始對《太平經》的成立時期、版本和內容構成等問題進行研究。<sup>7</sup>

第二個時期是從1959年起以後的幾年間，國內歷史學界，從著眼於《太平經》的階級性及與黃巾「起義」的關係等問題，而展開支持與反對的爭論。<sup>8</sup> 在這時期，另一方面尤有意義的進展是王明在1960年利用《道藏》殘本、《太平經鈔》，以及其他二十七種引書，校定出版了《太平經合校》；<sup>9</sup> 以後，中外學者大都據此合校本作為共同的參考本。此外，更由於受到日本學者吉岡義豐的研究突破的影響（後者利用斯坦因4226號敦煌殘卷對照《道藏》五十七卷《太平經》殘本的篇目），<sup>10</sup> 王明相繼發表〈敦煌古寫本《太平經》文字殘頁〉（1964）及〈《太平經》目錄考〉（1965）等重要文章，<sup>11</sup> 進一步校勘《太平經》和《太平經鈔》及詳細考證二者之間的關係。<sup>12</sup>

第三個時期可再約分前、後兩段時期。從1980年初起，國內學者重新展開討論《太平經》中的農民起義思想及維護封建君權意識的問題，當中以卿希泰〈試論《太平經》的烏托邦思想〉（1980）與劉琳〈論《太平經》的政治傾向〉（1981），及彼此之間的答辯文為代表。<sup>13</sup> 而據筆者搜集所得，其他學者在同時期發表類似爭論性的論文，也有十篇以上之多。<sup>14</sup> 在本文的第三部分，筆者會嘗試分析有關《太平經》政治性質的爭論背後的問題和意義。

上述前半段時期環繞經典的階級性討論差不多在1985年以後就終止；從後半段時期

<sup>5</sup> 參王平：《太平經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頁1-6。另外，日本學者蜂屋邦夫：〈太平經における言辭文書——共・集・通の思想——〉，《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92冊（1983年），注1，也有相同的解釋。

<sup>6</sup> 王平《太平經研究》認為「第一個階段是從一九三〇年到五十年代初」（頁1），這說法不準確。湯文發表在1935年，王文發表在1947年。此後直到1959年，再沒有中國學者發表研究《太平經》的論文。因此，差不多在整個五十年代，有關《太平經》的研究是沈寂的。

<sup>7</sup> 參本文附錄。

<sup>8</sup> 同上注。

<sup>9</sup> 王明撰《太平經合校》時還未曾利用敦煌本《太平經》作校，因此一些國內學者誤以為王明的合校本有利用敦煌卷子，這是不對的，見龍晦：〈《太平經注》序〉，《道家文化研究》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167。

<sup>10</sup> 吉岡義豐：〈敦煌本太平經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22冊（1961年），頁1-103。

<sup>11</sup> 參本文附錄。

<sup>12</sup> 王平在介紹這第二個時期，忽略了在有關《太平經》的階級性的爭論文章以外，王明在這時期另外作校勘工作方面的貢獻。見王平：《太平經研究》，頁2。

<sup>13</sup> 參本文附錄。

<sup>14</sup> 同上注。

開始直到現在，中國學者多轉而從經典中的個別主題思想和問題作具體考察，例如：深入闡釋「守一」、<sup>15</sup>「承負」、<sup>16</sup>「以十概全」、<sup>17</sup>「元氣」等觀念在《太平經》中的具體意思。此外，李剛最近發表一篇重要論文，題為〈也論《太平經鈔》甲部及其與道教上清派之關係〉，代表中國學者重新正視《太平經》與六朝道教歷史之間關係的研究，特別是考察古《太平經》怎樣經過上清派傳承和改造的曲折過程。<sup>18</sup>最後，在完結這部分有關中國學者研究《太平經》的發展概略，筆者還需要補充介紹林富士和劉昭瑞兩位年輕學者最近在解讀這古道經的成果，他們能運用新方法和新觀點對文本進行細緻和深入的分析；他們的研究成果相信對日後《太平經》的研究幫助甚大，這點筆者在下文再作交待。

以上簡介《太平經》研究的歷史，僅是從時序方面著眼，以下則嘗試從三個主要有關研究《太平經》的範圍和課題，深入分析中國學者在過去的研究成果、遇到的阻礙，以及一些還待解決的問題。這包括：（一）《太平經》成書時期與在道派當中傳承的問題；（二）《太平經》的社會思想爭論及不同體裁的研究；（三）《太平經》的宗教解釋系統。

### 〈太平經〉成書時期問題及在道教歷史中之傳承

關於現存《道藏》五十七卷《太平經》殘本的成書問題，中國學者從湯用彤開始，就根據文本內容的各方面考證，認定《太平經》成書於東漢時期。因此可以說，他們大致上是繼續湯用彤的考證方向，力求說明「〔《太平經》〕其中所有之事實學說，俱為漢代所已有」。<sup>19</sup>直到1982年，王明仍然執著這種說法：「關於《太平經》的成書時代問題，在這篇論文裏，我們認為基本上已經解決了。」<sup>20</sup>

除了湯用彤一文依據殘本中所提及的漢代地域制度的劃分、漢時盛行的讖緯陰陽五行說、五兵及刑德說等，得出「《太平經》者，上接黃老圖讖之道術，下啟張角、張陵之鬼教」的結論外，<sup>21</sup>王明又從經中出現的漢代口語名詞（如：「縣官」、「銖分」、「成事」、「何等」）、十三州的地理名稱、九等品評法、元氣說、王相休囚廢

<sup>15</sup> 丁貽莊：〈《太平經》中守一淺釋〉，《宗教學研究》1986年第2期，頁67-74。

<sup>16</sup> 陳靜：〈《太平經》中的承負報應思想〉，《宗教學研究》1986年第2期，頁35-39。

<sup>17</sup> 李家彥：〈《太平經》中以十概全的思想〉，《宗教學研究》1987年第3期，頁7-9。

<sup>18</sup> 李剛：〈也論《太平經鈔》甲部及其與道教上清派之關係〉，《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284-99。

<sup>19</sup> 湯用彤：〈讀《太平經》書所見〉，頁17。

<sup>20</sup> 王明：〈論《太平經》的成書時代和作者〉，頁183。

<sup>21</sup> 湯用彤：〈讀《太平經》書所見〉，頁17-21。

五行說等，「說明《太平經》是漢人的著作」。<sup>22</sup>此外，饒宗頤亦運用後漢五斗米道的《想爾注》與《太平經》互證，指出二者所發揮的「太平」與「三合相通」之義，「自是出於漢時」。<sup>23</sup>饒先生也考察出在《太平經》中所見之解字與《說文解字》之聲形訓有許多互通的地方。例如，他引《說文解字》解說《太平經》所記的「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頁219）<sup>24</sup>之義：

《說文》青字下云：「東方色也，木生火，從生丹，丹青之信，言必然。」按惠棟《讀說文記》云：「丹青之信言必然，漢時多為此語。《東觀漢記》光武詔明設丹青之信。」<sup>25</sup>

除了上述學者利用漢代文辭舊義、社會制度和思想內容考證《太平經》為傳世漢代文獻以外，最近中山大學劉昭瑞參考了出土於東漢中小型墓葬中的鎮墓文材料，以新的方法非常有力地考證出天師方士在經文中反覆強調的為人世間解除「承負」的說法，與鎮墓文中出現的漢代民間流行的生死觀和宗教行為，有非常脛合的地方；據劉氏，「二者不僅意義相同，連句式也相同」。<sup>26</sup>這種考證雖是利用了不同的材料，但是基本的目標都是繼承過往中國學者的研究方向，在多方面為《太平經》成書於東漢之說，提供有力和嚴謹的考證，而這也是他們在《太平經》研究上最為突出的貢獻。

雖然有些中國學者認為《太平經》成書時代的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不過，「東漢說」仍然未能解釋一百七十卷本經典成書的複雜過程。此外，更深入的問題還有：究竟《太平經》在漢以後是怎樣傳承的，以及它與後來六朝初唐時期各道教派別之間的關係又是怎樣的？

首先，《太平經》成書過程的問題，牽涉有關作者是何人的問題？一百七十卷並十部卷帙的數目及定本最早成於何時？「太平經」書名又是定於何時？以及今《道藏》殘本是否就是東漢順帝時宮崇所獻的神書？<sup>27</sup>過去，中國學者大都接受了下列兩點依據和推斷而回答上述的問題：

<sup>22</sup> 王明：〈論《太平經》的成書時代和作者〉，頁186-98。

<sup>23</sup> 饒宗頤：〈《想爾注》與《太平經》〉及〈想爾九戒與三合義——兼評新刊太平經合校〉，載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證》，頁89-90，103-13。

<sup>24</sup> 本文所引《太平經》均據王明：《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sup>25</sup> 饒宗頤：〈《太平經》與《說文解字》〉，載《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261。

<sup>26</sup> 劉昭瑞：〈《太平經》與考古發現的東漢鎮墓文〉，《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4期，頁111-19；另參劉昭瑞：〈「承負說」緣起論〉，《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4期，頁100-107及〈談考古發現的道教解注文〉，《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頁51-57。

<sup>27</sup> 湯用彤〈讀《太平經》書所見〉曾提及要證明這點甚困難：「但吾人若欲確證其〔現存本〕為宮崇所上、襄楷所見之原本，則自極難。」（頁16）

一、對於劉宋時代范曄(398-446)《後漢書·襄楷傳》及唐高宗時章懷太子李賢(651-684)注，一般中國學者都接受二者所載的歷史資料大致可信；<sup>28</sup>

二、《太平經》一百七十卷在漢代是罕見的大部頭的書籍，因此，中國學者大都推斷它不是一時一人之作，而是漢人擴充、增衍的成果。<sup>29</sup>

由於湯用彤、<sup>30</sup> 王明、<sup>31</sup> 陳櫻寧、<sup>32</sup> 卿希泰、<sup>33</sup> 湯一介<sup>34</sup> 等都傾向採取范曄的說法，因此他們多認為《太平經》的來源，與于吉、宮崇、襄楷之間的傳授有關。據他們的推斷，一百七十卷本的初本，可能只是源自幾卷底本，並且又可能與西漢成帝時齊人甘忠可的《包元太平經》有關，到後來桓帝、靈帝時，再經過于吉、宮崇、襄楷的不斷擴充，「神書」就發展成一百七十卷了。根據上述的推斷，「神書」之定為一百七十卷，並分為甲乙十部，在東漢末就似乎已經形成。<sup>35</sup>

在這個傳授推說的假設上，熊德基、蘇抱陽和王平分別再進一步具體化一百七十卷《太平經》在東漢末成書的過程。<sup>36</sup> 他們根據現今殘本中分別存在三種不同文體，即問答體、散文體和對話體，<sup>37</sup> 而推敲出三者各自分別完成的時間。熊德基和王平都認為散文體和對話體屬於《太平經》最先的「底本」或「本文」，並且以為是屬於順帝時「宮

<sup>28</sup> 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三十下，頁1081-84。

<sup>29</sup> 參王明：《太平經合校》，頁2；及〈論《太平經》的成書時代和作者〉，頁199；熊德基：〈《太平經》的作者和思想及其與黃巾和天師道的關係〉，《歷史研究》1962年第4期，頁10；卿希泰：〈試論《太平經》的烏托邦思想〉，《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2期，頁95；李養正：〈論《太平經》的人民性〉，《中國哲學史研究》1985年第3期，頁73；王平：《太平經研究》，頁9-14，21。另外，據筆者所知，反對「非一時一人所作」說的中國學者，僅見蘇抱陽：〈《太平經》成書的幾個問題〉，《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4期，頁14-21。

<sup>30</sup> 湯用彤：〈讀《太平經》書所見〉，頁13，23。

<sup>31</sup> 王明：〈論《太平經》的成書時代和作者〉，頁198-99。

<sup>32</sup> 陳櫻寧：〈太平經的前因與後果〉，載陳櫻寧：《道教與養生》（北京：華文出版社，1989年），頁43-47。

<sup>33</sup> 卿希泰（編）：《中國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冊，頁91。

<sup>34</sup> 湯一介：《魏晉南朝時期的道教》（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頁28。

<sup>35</sup> 湯用彤〈讀《太平經》書所見〉說：「漢末《牟子理惑論》稱有神書百七十卷。」（頁13）而王平《太平經研究》就說：「據此〔指《牟子理惑論》〕我們有理由推斷，在漢靈、獻之際，《太平經》已有一百七十卷之定本。」（頁11）關於《牟子理惑論》是否成書於後漢的考證，參牧田諦亮：《中國佛教史研究·第一》（東京：大東出版社，1981年），頁31。按牧氏，《牟子理惑論》成書於三國吳時而已。

<sup>36</sup> 參本文附錄。

<sup>37</sup> 熊德基最先把今本《太平經》內容，分為問答體、散文體和對話體。問答體指「真人純」與「天師」的問答；對話體指「真人」、「大神」或「神人」及「天君」的相互間對話，而其中無「天師」在內；散文體多指文中的四言語（頁9）。

崇所獻神書」的部分；<sup>38</sup> 至於問答體經文，熊德基則認為是「出於襄楷之手」，而且，就是作於他在桓帝延熹八年至九年上書之前（165-166）的時間。<sup>39</sup> 對於原來出於不同時期的「散文體和對話體」與「問答體」的最後拼合過程，熊德基只是籠統地推測為：「梁陳間，最晚在唐貞觀年間，被人將兩種書亂拼為一部，仍定為百七十卷。」<sup>40</sup> 王平雖然同樣分別三種不同體裁的各自出現次序，並且推斷「問答體之作者或即襄楷本人」，但是，他以為是「問答體之作者（或即襄楷本人）將三種文體之作品混編一書，定為一百七十卷」，換句話說，他仍然保留大多數中國學者的推斷，一百七十卷甲乙十部形式的《太平經》在東漢末已固定和流傳於世了。<sup>41</sup>

總括以上中國學者就《道藏》五十七卷殘本《太平經》成書問題的研究，大致上他們認為現存殘本就是東漢時期一百七十卷定本的殘存部分。雖然，在現存本是否就是《後漢書》中所載宮崇或襄楷所獻「神書」的問題上，還有些學者排除這樣可能性；但是，在尋索這部「不是一時、一地、一人的作品」的增衍、成書過程上，大部分中國學者站在于吉→宮崇→襄楷的傳授系統上，認為擴大了一百七十卷定本，雖是漢代不同階段的作品，但是至遲大約在桓、靈帝時期它已經固定、流傳於世。<sup>42</sup>

由於中國學者大都肯定現存《太平經》殘本「保持著漢代著作的本來面目」，<sup>43</sup> 並且認為一百七十卷定本已經在後漢末形成，因此，歷來他們對漢以後有關「太平經」卷數和名稱的不同記載，<sup>44</sup> 大都推斷為只屬於「內容大概相同」的不同傳本而已。<sup>45</sup> 這種「連續論」假設<sup>46</sup> 的弊病或會造成忽視了對不同版本記載的深入分析和比較，以及內中

<sup>38</sup> 熊德基〈《太平經》的作者和思想及其與黃巾和天師道的關係〉說：「散文體和對話體的經文是完全符合所謂宮崇所獻神書的內容的。」（頁15）另參王平：《太平經研究》，頁13-14。

<sup>39</sup> 熊德基：〈《太平經》的作者和思想及其與黃巾和天師道的關係〉，頁10。

<sup>40</sup> 同上注，頁15。

<sup>41</sup> 王平：《太平經研究》，頁14-15。

<sup>42</sup> 最近李剛發表的〈也論《太平經鈔》甲部又其與道教上清派之關係〉，已經放棄一百七十卷本《太平經》成書於東漢說。一方面，他相信「東漢末社會上已有《太平經》的不同抄本，書名也略有不同」；另一方面，關於一百七十卷定本，他認為要遲至「隋唐、北宋以一百七十卷為流行本」（頁286）。

<sup>43</sup> 王明：〈論《太平經》的成書時代和作者〉，頁200。

<sup>44</sup> 例如，東晉初葛洪（283-343）《抱朴子內篇》卷十九提及「《太平經》五十卷……《甲乙經》一百七十卷」（見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33）；同時期人虞喜（281-356）《志林》提及「《太平清領道》，凡百餘卷」（見《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四十六，頁1110）；隋唐道士孟安排《道教義樞》卷二「七部義」又記有：「太平洞極之經一百四十四卷。」（見《道藏》，上海：文物出版社等，1987年，第二十四冊，頁814）。

<sup>45</sup> 陳櫻寧：〈太平經的前因與後果〉，頁44-45；湯一介：《魏晉南朝時期的道教》，頁29。

<sup>46</sup> 例如，王明〈論《太平經》的成書時代和作者〉認為「自東漢至南朝末年，雖則屢經離亂，可是《太平經》的流傳，始終未曾斷絕」（頁200）。

可能蘊含具分歧性的文獻和歷史考證意義，<sup>47</sup> 以致更不能科學地和批判地正視「范曄說」背後資料來源的複雜問題。

此外，如果只停留在「東漢形成說和定本說」的定論，研究者或會不能進一步正視在不同時代的不盡相同的版本流傳和彼此之間的互相分別比較，換句話說，究竟東漢以後的不同傳本與晉以後的不同道派傳統發展有甚麼關係？再者，如果現存殘本原來只是出自唐初的寫本，哪究竟當中有沒有漢晉六朝以後道派思想的影響？<sup>48</sup> 舉一個例子，向來在中國學者研究中不受注意的，就是在《道教義樞》卷二之「七部義」所記載的在上清派傳承中的「甲乙十部、一百七十卷」本《太平經》和《正一經》所說的「《太平洞極之經》一百四十四卷」本《太平經》二者之間的異同問題。根據《道教義樞》的作者孟安排，南北朝時代至少流傳著兩種「太平經」，其一：「按《正一經》云，有《太平洞極之經》一百四十四卷」，其二：「今甲乙十部一百七十卷，今世所行」。<sup>49</sup> 兩者的關係又是如何的呢？倘若我們只是跟隨一些中國學者的看法，將正一派的一百四十四卷的《太平洞極之經》看成是後漢時期「太平經」定本的一種，或是把《太平洞極之經》看成是同一部經典但不同名稱，<sup>50</sup> 而又同時對另一流傳的甲乙本與所依附的上清系統之間的密切關係不加留意，<sup>51</sup> 那麼結果就是導致我們對現存《太平經》殘本背後所承載的自東漢以後還繼續不斷經歷長久和複雜的傳承過程，不能作細緻和科學的考察和描述。<sup>52</sup>

<sup>47</sup> 就漢以後對「太平經」不同卷數和名稱的記載的比較研究，參 Jens Ostergard Petersen, "The Early Traditions Relating to the Han Dynasty Transmission of the *Taiping Jing*," Part 1, *Acta Orientalia*, 50 (1989), pp. 133-71.

<sup>48</sup> 湯用彤〈讀《太平經》書所見〉已經指出過「正統本原據之寫本或陳末至唐初所寫也」（頁14），但此點中國學者多不注視其背後文獻考察意義。

<sup>49</sup> 《道教義樞》卷二第九「七部義」云：「太平者，此經以三一為宗。老君所說。……然其卷數，或有不同。今，甲乙十部合一百七十卷，今世所行。按《正一經》云：『有太平洞極之經一百四十四卷。』此經，並咸明治道，證果修因，禁惡眾術也。其洞極經者，按《正一經》：『漢安元年，太上親授天師（張道陵），流傳茲日。』若甲乙部，按《百八十戒》云：『是周赧王時，老君於蜀，授瑯耶干吉。』」（頁814）

<sup>50</sup> 陳櫻寧：〈太平經的前因後果〉，頁44-45；湯一介：《魏晉南朝時期的道教》，頁29。

<sup>51</sup> 《太平經》與南朝上清派的不尋常淵源關係，可從《太平經復文序》和《三洞珠囊》卷一引《道學傳》第十五卷所載陶宏景弟子桓法闡尋得《太平經》之事得到證明。

<sup>52</sup> 就上清派傳承的「甲乙十部、一百七十卷」本《太平經》與「太平洞極之經一百四十四卷」本《太平經》的研究，參吉岡義豐：〈敦煌本太平經について〉，頁1-103；前田繁樹：〈再出本《太平經》について——六朝末道教諸派の中心——〉，載《道教文化への展望》（東京：平河出版社，1994年），頁153-78；而最近李剛的〈也論《太平經鈔》甲部及其與道教上清派之關係〉也補充了中國學者過去在這方面研究的不足，但是，他把《敦煌本太平經》與上清派傳統中的甲乙本區分為兩種不同傳本的說法，與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頗有出入的地方（參其文頁286）。

## 《太平經》的社會思想及不同體裁的研究

五十年代末中國大陸學術界對《太平經》的社會思想的不同方向爭論，在一定程度上受著當時政治階級鬥爭和歷史唯物觀思潮的影響。但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從經典本身多樣性與多層性的思想內容來看，倘若贊成它是農民革命經典和認為它是為統治階級宣揚忠君思想的兩方面立場，都能有充分的經文理據支持，這現象究竟反映、提示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宗教思想史的方法上是否需要修正甚至放棄一些已固定的觀點。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中國學者在《太平經》的研究上，與六十年代初的爭論具同樣性質、類似對峙的觀點、甚至出現重覆的經文引證的辯論在八十年代初重新展開。這次爭論，雖說「論戰雙方均採取了比較溫和的態度」，<sup>53</sup>但是，我們仍然可以這樣概括，八十年代卿希泰和劉琳的相反論證基本上是重覆運用過去楊寬和王戎笙之間爭辯的正反觀點。<sup>54</sup>因此，就深化認識《太平經》的社會思想和試圖克服在這方面解讀上的困難而言，八十年代初期在中國學術界的辯論可說難有突破性的成果。

撇開階級的意識形態框框去爭論《太平經》有否反映農民羣眾的願望，或者避免去界定《太平經》是否屬農民革命著作，其實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太平經》對漢末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批評與不滿是相當具體的。作者極為關注當時人民所遇到的社會不安、天災、戰亂、疾病和冤訟，以及期望它們能夠消解。因此，《太平經》說：

今天地陰陽，內獨盡失其所，故病害萬物。帝王其治不和，水旱無常，盜賊數起，反更急其刑罰，或增之重益紛紛，連結不解，民皆上呼天，縣官治乖亂，失節無常，萬物失傷，上感動蒼天，三光勃亂多變，列星亂行。<sup>55</sup>

《太平經》的社會批判，跟東漢末王符、仲長統等所代表的逸民知識分子對豪族階層擴大化而引致舊有的鄉里秩序崩潰的批判風潮有相互對照的地方。<sup>56</sup>例如在卷六十七「六

<sup>53</sup> 王平：《太平經研究》，頁3。

<sup>54</sup> 卿希泰：〈試論《太平經》的烏托邦思想〉，《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2期，頁94-99及〈《太平經》中反映農民願望的思想不能抹殺——答劉琳〉，《社會科學研究》1981年第5期，頁101-4；劉琳：〈論《太平經》的政治傾向——兼與卿希泰同志商榷〉，《社會科學研究》1981年第4期，頁90-94及〈再談《太平經》的政治傾向——答卿希泰同志〉，《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2期，頁101-4。

<sup>55</sup> 《太平經合校》，頁23。

<sup>56</sup> 就漢末逸民知識分子與豪族的對抗，參川勝義雄：〈漢末のレジスタンス運動〉，《東洋史研究》25卷4號(1967年)，頁23-50；侯外廬等：《中國思想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二卷，頁331-441。



罪十治訣」，作者強烈的抨擊當時富裕豪族「或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飢寒而死」，<sup>57</sup> 並且憤慨地認為豪族之不肯救窮周急，正是為天地所怨咎：

〔億萬之家〕見人窮困往求，罵詈不予；既予不即許，必求取增倍也；而或但一增，或四五迺止。賜予富人，絕去貧子，令使其飢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與天為怨，與地為咎，與人為大仇，百神憎之。<sup>58</sup>

除了批判豪強經濟勢力擴大對鄉里制度的破壞以外，《太平經》作者還在政治上抨擊中央與地方官吏在任人處事上對善人賢者排斥；又指出民間冤訟受層層扣壓，意見不能上達，而假若下情真能上達於帝王時，兇悍官吏或會即時或後來加害於那些上書者。<sup>59</sup> 此外，作者又非常同情民間百姓在當時經濟生活上所遭受的「貧困愁苦」，肯定地認為天下事最急需解決實現的只有「三急」：（一）人民能得飲食，以保全天所授的形體；（二）夫婦能傳類相生，無絕後世；（三）人民能得到衣服之蔽。<sup>60</sup> 這三急基本上代表人類在自然世界生存能得到生長養育的必須條件；缺此，一方面既反映受害者的貧困愁苦、災變連年的處境，另一方面就是表示他們在其他更高的生命素質上同樣得不到發展機會，這正如《太平經》作者說：「夫人不衣，固不能飲食，合陰陽，不為其善。」<sup>61</sup>

上述所概括的在《太平經》反映作者對當時亂世社會、小農與貧農的經濟困境、官吏的背上利下等社會危機的醒覺和抗議意識，中國學者從五十年代末的楊寬、喻松青、王明到八十年代的卿希泰、李養正、馮達文等已經捕捉和發揮得很好了，不必再交待。但是，如果根據這部分內容而好像一些中國學者所作的進一步推斷，即是說《太平經》這部分社會思想包含一種所謂農民嚮往的「平均主義」和「財產公有」的理想社會，<sup>62</sup> 這種推斷結果似乎是說明研究者讓現代政治主義過多地壟斷經文本本身的意思。因此，上述論斷的主要問題所在並不一定好像另一羣持相反立場的學者所言：《太平經》還有另外更主要的部分是有關「助帝王治」、「擁護漢王朝統治」或「君權神授」等應帝王的

<sup>57</sup> 《太平經合校》，頁242；又參王符《潛夫論·忠貴》篇對當時豪族缺乏救窮周急的指諷：「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見王符著，汪繼培箋：《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13）

<sup>58</sup> 《太平經合校》，頁246-47。

<sup>59</sup> 同上注，頁313-15。

<sup>60</sup> 同上注，頁43-47。

<sup>61</sup> 同上注，頁44。

<sup>62</sup> 見卿希泰：〈試論《太平經》的烏托邦思想〉，頁98；李養正：〈論《太平經》的人民性〉，頁70-71；馮達文：〈《太平經》剖析〉，《中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3期，頁2。

思想內容；<sup>63</sup> 而是，許多時一些中國學者對《太平經》中的「太平」觀念的詮釋或許與經文的原意存在一段距離。<sup>64</sup> 例如，卿希泰解釋《太平經》所言的「平之為言者，乃平平無冤者，故為平也」為「人人平等而又公平的平均主義原則」；<sup>65</sup> 李養正則將《太平經》的「太平」界定為：（一）「要求生存權利的平等」；（二）「要求在生活資料分配方面的平均」；（三）「自然氣候的調和」與「社會的安寧」。<sup>66</sup> 但是，如果具體地從《太平經》作者所描述的上古「太平之世」或是當「太平氣」將至的「太平之世」的景象來看，二者並沒有現代人所謂社會平等或財產平均的思想。<sup>67</sup> 《太平經》的理想上古之世是：

是故上古三皇垂拱，無事無憂也。其臣謹良，憂其君，正常心痛，乃敢助君平天下也，尚復為其索得天上仙方以予其君也，故其君得壽也。<sup>68</sup>

而當太平氣在今世上再來到的時候，《太平經》描述人民在理想社會生活的景象為：

今太平氣至，乃天與神兵共治，故斷刑罰兵杖爭訟，令使察察，萬世不復妄也。皆如日月，不可久蔽藏也。元氣自然樂，則合共生天地，悅則陰陽和合，風雨調。風雨調，則共生萬二千物。凡物樂，則奇瑞應俱出，生萬物之應，精上著天，三光更明察察也。……四時樂喜，五行不逆，則人民興。人民興則帝王壽，帝王壽則凡民樂，凡民樂則精物鬼邪伏矣。<sup>69</sup>

因此可以說，《太平經》作者所嚮往的不能說是屬於現代人意識所謂平等主義的社會制度，相反而言，作者要求的理想社會形態是回到上古三皇之世的理想時代，當中的生活素質是君臣民都能合於真道的教化，得天地的心，守天地元氣。結果，就是「天地病除，帝王安且壽，民安其所，萬物得天年，無有怨恨，陰陽順行，羣神大樂且喜悅」。<sup>70</sup>

另一方面，相對以上所討論的王明、李養正及卿希泰等論點，從五十年代末王戎

<sup>63</sup> 見王平：《太平經研究》，頁34；劉琳：〈論《太平經》的政治傾向〉，頁92；及楊寬：〈論《太平經》〉，頁48。

<sup>64</sup> 就今本《太平經》直接解釋何謂「太平」的意思，參卷四十八「三合相通訣」（頁148）；卷九十三「敬事神十五年太平訣」（頁398）；及卷九十八「包天裏地守氣不絕訣」（頁451）。

<sup>65</sup> 卿希泰：〈試論《太平經》的烏托邦思想〉，頁98。

<sup>66</sup> 李養正：〈論《太平經》的人民性〉，頁69-71。

<sup>67</sup> 對《太平經》的「太平」理論的研究，參神塚淑子，〈《太平經》の承負と太平の理論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學教養部紀要・A》第32輯（1988年），頁43-48。

<sup>68</sup> 《太平經合校》，頁139。

<sup>69</sup> 同上注，頁647-48。

<sup>70</sup> 同上注，頁468。

笙、熊德基到八十年的劉琳、鍾肇鵬、朱伯崑，甚至湯一介、王平等學者，<sup>71</sup> 在不同程度均認為《太平經》的目的並不是要反映甚麼農民的願望和要求，這部書根本的目的就是助帝王化民治國、應帝王、希望漢家王朝更興盛。直到最近，王平在這脈絡主流下仍然結論出：「〔《太平經》〕一切複雜的，乃至自相矛盾的內容並不是隨意、胡亂的拼湊，而是在『助帝王治』這根本意旨之下被統一起來、囊括起來的」。<sup>72</sup>

上述部分中國學者的觀點反映出兩個在方法和思想內容上的特點。首先，歷來研究《太平經》的首要方法學問題是，在現存五十七卷的殘本中可否反映當中存在一個中心意旨而能夠統一貫串其他多樣和龐雜的思想內容？對王明、喻松青、李養正和卿希泰等學者來說，《太平經》在成書過程上，「不是出於一時一人之手，所以內容龐雜，既有反映農民思想的進步言論，又有落後的乃至反動的思想」，因此，本質上這是「一部〔經過很多人〕集體編寫的道書」。<sup>73</sup> 但是，對另一羣持相反立場的學者來說，這種方法上的選擇的問題正是在於缺乏對經典內容的一致性或者整體性的分析，借用劉琳的批評：「因此〔它〕就只能滿足於指出它『既有』某種思想，『又有』某種思想」。<sup>74</sup> 不滿意於這種研究方法及其缺點，部分學者接納熊德基的方法和結論，一方面同意熊氏把《太平經》中的不同體裁劃分為問答體、散文體和對話體，這樣就出現由「真人」與「天師」的問答而組成的問答體基本上佔現存五十七卷殘文的絕大部分的結果（包括四十七卷，共八十三篇）。<sup>75</sup> 其次，因為這部分問答體經文的獨特用語、文風及其思想都表現一致的脈絡，許多學者都接受熊氏的結論：「問答體出於一人」。<sup>76</sup> 在這個基礎上，後來一些學者繼續嘗試把《太平經》的問答體部分看作一個經典的整體，嘗試從中「抓住它的思想體系的核心和總的傾向」。<sup>77</sup>

其次，從《太平經》在史書出現的脈絡背景而言，例如宮崇和襄楷先後的獻書於帝王，以及再結合經文中天師自始至終都叮嚀弟子真人獻書給帝王的話，<sup>78</sup> 從楊寬、熊德

<sup>71</sup> 參本文附錄。

<sup>72</sup> 王平：《太平經研究》，頁34。

<sup>73</sup> 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頁124-25，200；另見卿希泰：〈試論《太平經》的烏托邦思想〉，頁95；及李養正：〈論《太平經》的人民性〉，頁73。

<sup>74</sup> 劉琳：〈再談《太平經》的政治傾向〉，頁101。

<sup>75</sup> 熊德基：〈《太平經》的作者和思想及其與黃巾和天師道的關係〉，頁10；另參高橋忠彥：〈《太平經》の思想構造〉，《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95冊（1984年），頁295-336。

<sup>76</sup> 熊德基：〈《太平經》的作者和思想及其與黃巾和天師道的關係〉，頁10。

<sup>77</sup> 劉琳：〈再談《太平經》的政治傾向〉，頁101。另參蘇抱陽：〈《太平經》成書的幾個問題〉，頁21；及王平：《太平經研究》，頁22。

<sup>78</sup> 例如：「但以文書付歸德君。德君，天之子也。」（《太平經合校》，頁141）又如：「得吾書者，以付上德之君。」（頁279）

基到劉琳、王平等部分中國學者都認定《太平經》的作者所以造作這書，根本意圖就是幫助帝王統治，消解當時的社會動亂、政治不安和自然災害。王平作以下結論：

問答體之作者……一再強調應將該書「付有德之君」，以圖對帝王的現實政策發生影響，實際起到幫助帝王振刷政治，挽救危機的作用，其「助帝王治」的用心更為良苦。<sup>79</sup>

總結上述部分學者的嘗試，即期望在《太平經》多樣與龐雜的思想內容當中，梳理出內中的某些一致性的主題和寫作動機，這是在文本研究上的合理和不能忽視的方法。但是，中國學者在尋求建立《太平經》的根本和整體意義過程上，往往偏向於把經典本身作為某作者的特定歷史社會意識形態的反射(representation)。這正如熊德基、劉琳、王平等一方面把《太平經》整體思想與其中問答體部分等同起來，而又進一步印證它只是襄楷等後漢士大夫階層的試圖改良和維護帝王統治的政治意識反射。但是，在達到這個推論以前，還需要深入考察以下的問題：

一、雖然在問答體部分，天師屢屢囑咐真人，要把天師之書上付有德之君，並且強調致太平之道當是正統地從上而下，說：「凡事當順，故以上下也。不以上下，則為逆氣。」<sup>80</sup>但是，天師也同樣要求真人不但不可以把傳書匿藏，相反要將書曉示凡民百姓，使他們可以「共記共誦」；<sup>81</sup>天師甚至提醒真人倘若在教授之時，凡民仍有不曉真道之處，真人應該改用其「俗語」、「隨其俗」教導之，<sup>82</sup>因為最終目的就是要使他們得天意，應天心，能解除天地承負之謫。因此天師說：

是故教真人急出此書，慎無藏匿，以示凡民，百姓見禁且自息，如不止，禍及後世，不復救。<sup>83</sup>

又說：

吾為太平德君制作法度，不限一人也。夫太平氣來，有一人自冤不得其欲者，則上皇平氣不得俱來至也。故天教吾廣開闢其路，使得自恣自擇可為也。<sup>84</sup>

這樣看來，天師在問答體部分期望和要求他的真道能傳達到天下凡民去，確使他們能得

<sup>79</sup> 王平：《太平經研究》，頁23。

<sup>80</sup> 《太平經合校》，頁256。

<sup>81</sup> 就《太平經》的「共」的觀念及其與「集」和「通」之間的關係，參蜂屋邦夫：〈太平經における言辭文書〉，頁35-81。

<sup>82</sup> 《太平經合校》，頁393。

<sup>83</sup> 同上注，頁125；同書又云：「無匿此文，使凡人當自知質文所失處，深念其意。」（頁48）

<sup>84</sup> 同上注，頁451。

曉天意；這點就非常具體地引伸出問答體內容所包含的「共、集、通」思想，以及說明其目的就不能僅限於助帝王治，雖然對作者來說帝王以道德統治是解除天地承負之害的必要條件。

二、中國學者為建立《太平經》中思想內容的一致性和整體性，往往把現存四十三卷問答體的內容假定為最真實地代表《太平經》的主要思想，為核心的研究對象。此外，散文體和對話體，就只視作問答體之前或以後的「混雜」部分，「混編」一起，並且本身「內容平平，無甚可取」。<sup>85</sup> 正因為存在這種選擇性假設，就是直到現在，有關現存殘本中的這兩部分文體和內容的深入研究，在中文著作裏還沒得見。<sup>86</sup> 從現時缺乏對三種《太平經》文體和思想之間的共通關係的客觀研究，有關《太平經》中思想內容的一致性和整體性的提議仍是有欠缺說服力的地方，需要等待將來有突破性的考察。

### 《太平經》的解釋系統與宗教觀點：承負與疾病

八十年代初在中國學者之間重新展開的有關《太平經》的階級性及社會政治思想的爭論，並沒有突破過去分歧的觀點，也未能擴大對經典本身在漢代宗教精神文化及道教思想發展史等層次上的深入理解與分析。結果，從八十年代後期到現在，較多研究者轉從個別題目入手，嘗試深入闡釋書中的具體思想。有學者認為上述研究方向的轉變，乃是出於研究者「迴避對根本問題的直接探討，而關注於具體內容上的闡釋與辨析」。<sup>87</sup> 這個解釋若是反映現在中國學術界主流的發展路向，筆者相信這將是深入研究《太平經》的良好選擇。

最近十年中國學者在個別題目上的研究成果，分別包括有考察《太平經》中的「元氣論」、「三合相通說」、「守一說」、「以十概全的思想」、「承負報應說」、「天人感應說」等。<sup>88</sup> 這種多樣化地從個別題目研究，對深入認識《太平經》本身的豐富和複雜的思想系統幫助很大，並且又因為能夠暫時擺脫一些先入為主的意識形態限制，因而較容易深入演繹分析出經典思想內部中具理性的意義結構（rational structure of meaning），同時避免了所謂唯心或宗教迷信的簡化標籤。然而，在繼續以個別題目形式去闡釋《太平經》的複雜思想系統以外，研究者若能夠在把握文本的多層性思想結構的同時，整合出其背後所包涵指涉的社會時代、文化及宗教的價值意義，就能幫助我們更

<sup>85</sup> 王平：《太平經研究》，頁14；劉琳：《再談〈太平經〉的政治傾向》，頁101。

<sup>86</sup> 日本學者高橋忠彥曾發表兩篇有關《太平經》的散文體和對話體的研究分析，其一是〈《太平經》の思想構造〉，《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95冊（1984年），頁295-336；其二是〈《太平經》の會話體の性格について〉，《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105冊（1988年），頁242-81。

<sup>87</sup> 王平：《太平經研究》，頁5。

<sup>88</sup> 參本文附錄。

進一步理解《太平經》如何構成爲一部與它所持守與傳播的宗教羣體有真實生命價值連繫的道教經典。

與此上述研究方向有直接或間接的，可舉最近中國學者劉昭瑞和林富士分別發表的有關《太平經》中「承負」與「疾病」觀念的論文。<sup>89</sup> 雖然學者已經指出過追求實現太平之世的論述不單只見於道教的《太平經》，兩漢以來的儒家也倡導這樣的理想，例如，見諸《春秋繁露》及《白虎通》對「太平」觀念的強烈意識；<sup>90</sup> 但是，重要的是儒、道二者的分別就是在乎彼此對問題根源分析所依據的不同價值系統，及由此而提出的使人相信依從的價值指示與行爲習慣指引。<sup>91</sup> 對《太平經》的作者來說，「太平之世」能否實現，就與天地的承負和疾病的解決有最必然的關係，甚至可說《太平經》的目的和天師（作者）所自覺被授與的重責就是要解釋天地之間疾病、災禍、危機的根本緣由，而更重要的是提出解決的方法。<sup>92</sup>

例如，按照《太平經》，天師由始至終都宣告他從天所接受的使命，就是要爲帝王人民解除「天地開闢以來承負之責」，<sup>93</sup> 斷絕「天地開闢以來，流災委毒之謫」。<sup>94</sup> 對天師來說，今世正當是自上中下三古以來人民厄冤最劇烈、承負積重最大的時代，以致「其氣冤結上動天」。<sup>95</sup> 根據天師的解釋：

今天地陰陽，內獨盡失其所，故病害萬物。帝王其治不和，水旱無常，盜賊數起，反更急其刑罰，或增之重益紛紛，連結不解，民皆上呼天，縣官治乖亂，失節無常，萬物失傷，上感動蒼天，三光勃亂多變，列星亂行；故與至道可以救之者也。<sup>96</sup>

不單人民在外在生活遭受社會自然界的「不安、失亂」的威脅，個人也因失真道之餘，連自己的生命年壽也同樣受威脅、傷害：

<sup>89</sup> 劉昭瑞：〈《太平經》與考古發現的東漢鎮墓文〉及〈「承負說」緣起論〉；林富士：〈試論《太平經》的疾病觀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二本第二分（1993年），頁225-63。

<sup>90</sup> 參湯一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頁75-76；間嶋潤一：〈太平の河圖・洛書——前漢武帝期の太平國家の構想——〉，《東方宗教》卷80（1992年），頁1-14。

<sup>91</sup> 關於文化與宗教怎樣在扮演爲人類提供對存在世界的整體價值解釋的功能，參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sup>92</sup> 劉昭瑞：〈「承負說」緣起論〉，頁100；林富士：〈試論《太平經》的疾病觀念〉，頁225。

<sup>93</sup> 《太平經合校》，頁163。

<sup>94</sup> 同上注，頁86。

<sup>95</sup> 同上注，頁36；關於《太平經》的歷史觀之研究，參神塚淑子：〈《太平經》の承負と太平の理論について〉，頁42-48。

<sup>96</sup> 《太平經合校》，頁23。

太上中古以來，人多愚，好爲浮華，不爲眞道，又多邪氣狂精殃咎，故人多卒窮天年而死亡。<sup>97</sup>

下古人多病，或有一人十數病，乃有自言身有百病者，悉無不具疾苦。<sup>98</sup>

面對這樣天地崩裂、人民多疾死的情況，天師言其心憂不安而後感天授與他使命差遣：「今甚病之憂之，人多無罪而死，上感天。天故遣吾下，爲其具言。」<sup>99</sup>

從解釋在處境實況出現的紛紛自然災禍、社會動亂、人多病死的現象，《太平經》提出「承負說」的解釋系統。本質上它屬於一種以家族血緣關係的互相影響爲基礎但又擴及對人類全體性社會行爲結果和命運的宗教倫理解釋系統。<sup>100</sup>《太平經》對「承負說」作以下的定義：

承者，適謂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積久，相聚爲多，今後生人反無辜蒙其過謫，連傳被其災，故前爲承，後爲負也。<sup>101</sup>

一方面，承負說就個人倫理行爲善惡的責任和報應的解釋，就是從時空線上不再僅限於個體自己的善惡報應的考慮，而是擴大到家族血緣上祖先與後輩之間上下互動的因果影響、補償和抵消。<sup>102</sup>而另一方面，所謂從人類全體行爲與自然災害的互爲影響而言，承負說更指出個人罪惡不單延及後代，並且更導致人間世的疾病、兵凶、水禍。結合個人的血緣關係與社會全體生活的命運，人類的罪惡行爲和禍福報應都是作用在上述兩個層面，而又構成二者之間非常緊密的互動影響關係。依據這個獨特的宗教倫理價值系統，《太平經》就是嘗試解釋當下社會與個人的種種病禍的根緣，這是連綿不斷的從過去到現在的承負的結果，因此就不是甚麼天地自然周期的命運結果，更否定災異命定的決定說。《太平經》這樣清楚堅持：「然古今之文，多說爲天地陰陽之會，非也，是皆承負厄也。」<sup>103</sup>

因此，正如劉昭瑞在他有關「承負說」的研究中，開宗明義的清楚說明「『承負說』是《太平經》一書反覆議論的重要主題，幾乎該書每卷都要提到『承負說』」。<sup>104</sup>

<sup>97</sup> 同上注，頁295。

<sup>98</sup> 同上注，頁294。

<sup>99</sup> 同上注，頁372。

<sup>100</sup> 參陳靜：〈《太平經》中的承負報應思想〉，頁38。

<sup>101</sup> 《太平經合校》，頁70。

<sup>102</sup> 從這點而言，雖然承負說的來源可能與《易·坤·文言》中的「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有關，但是，從善惡報應的時空線而言，承負說已經擴大了個體對後世的責任影響。參陳靜：〈《太平經》中的承負報應思想〉，頁38。

<sup>103</sup> 《太平經合校》，頁371。

<sup>104</sup> 劉昭瑞：〈「承負說」緣起論〉，頁100。

此外，依筆者所見，天師自覺的使命、他向真人的解說，以及有關《太平經》三種文體的目的等等都是與此說並存，隸屬於同一的價值系統。也正是要重新正視這承負說的價值系統，《太平經》的研究才可以擺脫過往有關階級性的爭論，而能更深入地考察它在中國古代宗教精神史上所揭示的生死終極世界。<sup>105</sup>

就解開《太平經》有關解除承負之謫的目的的終極世界，劉昭瑞的新方法給予我們很重要的啟發。在考察東漢鎮墓文材料所反映出有關漢人在生死問題的憂慮與祈禳中，劉先生發現《太平經》的承負和解謫觀念都能與漢墓文材料相輔對證。一方面，他能指出承負說的信仰是漢或更古的人對祖先死後魂神信仰的表現，即是相信死者仍然會作祟於生人的種種禍福生活上。另一方面，例如從鎮墓文來說，它反映出死者家人如何急切祈求藉著方士之上章等道術而禳除死者的流餘罪過，免致殃及後人。<sup>106</sup> 從這方面有關漢人葬墓信仰的考察，再結合《太平經》的承負、解謫的思想，劉先生的研究充分說明《太平經》的解釋系統確實豐富地承載著當時漢人在尋索人死後命運與生者之在世苦疾的問題上，所作的積極的宗教象徵行為與建立意義世界的有關宗教，正如他所說：

天師所傳，當然是有為而發，所針對的應該就是當時民間頗為流行的人生有過，殃及後人，死後受殃的生死觀，而解除死者在地下的承負之厄，就成了民間巫師方士的責任，也就必反映到鎮墓文中來。<sup>107</sup>

因此，如果我們只是把《太平經》的最根本目的看作是僅為帝王治的政治論述，結果就掌握不到它的宗教視野，即是說，它對個體和全體所受的承負厄害的關注，以及期望解除那似乎是屬於終極之世所彰顯的承負災異危機。

## 結語

總結中國學者在過去六十餘年《太平經》研究的成果，其中最大的特色是突出經典本身的社會思想與後漢政治歷史的密切關係，以及對《太平經》東漢成書說的執著。但是，在深入研究《太平經》所反映漢代宗教精神史方面，仍未能獲得充分的關注和研究。例如：《太平經》與漢人的讖緯災異宗教思想之間關係的研究、《太平經》與漢人的生死觀和終極觀的詳細分析、《太平經》與漢代方術道士的傳統的探索等等，中國學者在這

<sup>105</sup> 最近日本學者小南一郎在〈漢代の祖靈觀念〉一文中就提出《太平經》對後漢人在生死問題的精神史上的貢獻，文載《東方學報》第66冊（1994年），頁1-62。

<sup>106</sup> 有關後漢人為死者解除罪謫的信仰行為與道巫方士之間的關係研究，參吳榮曾：〈鎮墓文中所見到的東漢道巫關係〉，載吳榮曾：《先秦兩漢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362-78。

<sup>107</sup> 劉昭瑞：〈「承負說」緣起論〉，頁113。



方面宗教史的研究還未夠深入。再者，中國學者在考察《太平經》的傳本與兩晉六朝以後道教發展歷史之間的關係上，仍未能適當地重視和批判地吸收國外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別是，在利用敦煌古寫本的目錄及前後序、《太平經鈔》、《太平經復文序》等資料來研究今本《太平經》與六朝末上清派的關係，仍有待更深入的發展和重視。

### 附錄：中國學者《太平經》研究論著一覽

| 序號 | 作者          | 文章名或書名                      | 出版資料   |
|----|-------------|-----------------------------|--|
| 1  | 湯用彤         | 〈讀《太平經》書所見〉                 | 《國學季刊》第五卷(1935年)，頁7-33   |
| 2  | 王明          | 〈論《太平經》甲部之偽〉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1947年)，頁375-84；另收載於王明：《道家 and 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頁201-14 |
| 3  | 饒宗頤         | 〈《想爾注》與《太平經》〉               | 收載於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箋》(香港，1956年)，頁98-101   |
| 4  | 楊寬          | 〈論《太平經》——記我國第一部農革命的理論著作〉    | 《學術月刊》1958年第9期   |
| 5  | 王戎笙         | 〈試論《太平經》〉                   | 《歷史研究》1959年第11期，頁47-59   |
| 6  | 侯外廬         | 〈中國封建社會前後期的農民戰爭及其綱領口號的發展〉   | 《歷史研究》1959年第4期   |
| 7  | 中華書局<br>哲學組 | 〈史學界討論《太平經》的性質其太平道和黃巾起義的關係〉 | 《人民日報》1960年12月15日  |
| 8  | 喻松清         | 〈老子道家與《太平經》〉                | 《光明日報》1961年6月4日  |
| 9  | 王明          | 〈從墨子到《太平經》的思想演變〉            | 《光明日報》1961年12月1日；另收載於《道家 and 道教思想研究》，頁99-107   |
| 10 | 巨贊          | 〈湯用彤著《佛教史》關於《太平經》與佛教的商兌〉    | 《現代佛教》1962年第6期，頁13-16  |
| 11 | 熊德基         | 〈《太平經》的作者和思想及其與黃巾和天師道的關係〉   | 《歷史研究》1962年第4期，頁8-25   |
| 12 | 陳櫻寧         | 〈《太平經》的前因與後果〉               | 《道協會刊》1962年第1期；另收載於陳櫻寧：《道教與養生》(北京：華文出版社，1989年)，頁42-62                                  |

| 序號 | 作者  | 文章名或書名                      | 出版資料   |
|----|-----|-----------------------------|--|
| 13 | 熊德基 | 〈《太平經》及其同黃巾等關係研究〉           | 《人民日報》1962年9月4日  |
| 14 | 喻松清 | 〈《太平經》與黃巾的關係——與熊德基同志商榷〉     | 《新建設》1963年2月號，頁75-81   |
| 15 | 喻松清 | 〈道教的起源與形成〉                  | 《歷史研究》1963年第5期，頁147-64   |
| 16 | 饒宗頤 | 〈想爾九戒與三合義——並評新刊《太平經合校》〉     | 《清華學報》新四卷第二期(1964)；另收載於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03-13 |
| 17 | 王明  | 〈敦煌古寫本《太平經》文字殘頁〉            | 《文物》1964年第8期；另收載於《道家 and 道教思想研究》，頁238-40                       |
| 18 | 王明  | 〈《太平經》目錄考〉                  | 《文史》第四輯(1965年)，頁19-34；另收載於《道家 and 道教思想研究》，頁215-37              |
| 19 | 饒宗頤 | 〈《太平經》與《說文解字》〉              | 《大陸雜誌》第45卷第6期(1972年)；另收載於《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258-65  |
| 20 | 卿希泰 | 〈《太平經》的知人善任思想分析〉            | 《思想戰線》1979年第2期   |
| 21 | 卿希泰 | 〈《太平清領書》的出現及其意義〉            | 收載於卿希泰：《中國道教思想史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一卷                        |
| 22 | 卿希泰 | 〈《太平經》的哲學思想〉                | 《四川師院學報》1980年第1期，頁9-13   |
| 23 | 卿希泰 | 〈試論《太平經》的烏托邦思想〉             | 《社會科學研究》1980年第2期，頁94-99  |
| 24 | 馮達文 | 〈《太平經》剖析——兼談《太平經》與東漢末年農民起義〉 | 《中山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頁1-12   |
| 25 | 魏啟鵬 | 〈《太平經》與東漢醫學〉                | 《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期，頁101-9  |
| 26 | 鍾肇鵬 | 〈論《太平經》和太平道〉                | 《文史哲》1981年第2期，頁79-88   |

| 序號 | 作者  | 文章名或書名                     | 出版資料  |
|----|-----|----------------------------|---|
| 27 | 吳樹明 | 〈試論《太平經》〉                  | 《河北師大學報》1981年第3期  |
| 28 | 劉琳  | 〈論《太平經》的政治傾向——兼與卿希泰同志商榷〉   | 《社會科學研究》1981年第4期，頁90-94                                 |
| 29 | 卿希泰 | 〈《太平經》中反映農民願望的思想不能抹殺——答劉琳〉 | 《社會科學研究》1981年第5期，頁101-4                                 |
| 30 | 王明  | 〈論《太平經》的成書時代和作者〉           | 《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頁17-26；另收載於《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頁183-200        |
| 31 | 李養正 | 〈論《太平經》看早期道教的信仰特點〉         | 《道協會刊》1982年第10期；另收載於李養正：《道教經史論稿》（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頁42-65 |
| 32 | 劉琳  | 〈再談《太平經》的政治傾向——答卿希泰同志〉     | 《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2期，頁101-4                                 |
| 33 | 金春峰 | 〈讀《太平經》〉                   | 《齊魯學刊》1982年第3期  |
| 34 | 李養正 | 〈《太平經》與早期道教〉               | 《道協會刊》1982年第9期  |
| 35 | 李養正 | 〈試論《太平經》的產生與演變〉            | 《道協會刊》1982年第12期   |
| 36 | 李家彥 | 〈《太平經》的元氣論〉                | 《宗教學研究》1983年第4期，頁11-16                                  |
| 37 | 孫達人 | 〈《太平清領書》和太平道〉              | 收載於《中國農民戰爭史論》（1983年），頁112-37                            |
| 38 | 劉序琦 | 〈略論《太平經》思想的幾個問題〉           | 《江西師院學報》1983年第3期  |
| 39 | 朱伯崑 | 〈張角與《太平經》〉                 | 《中國哲學》1983年第4期，頁169-91                                  |
| 40 | 王明  | 〈論《太平經》的思想〉                | 收載於《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頁108-9                                   |
| 41 | 湯一介 | 〈關於《太平經》成書問題〉              | 《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一期（1984年）                                    |
| 42 | 李養正 | 〈論《太平經》的人民性〉               | 《中國哲學史研究》1985年第2期，頁68-74；另收載於《道教經史論稿》，頁90-99            |
| 43 | 趙焜堯 | 〈論《太平經》的性質〉                | 《溫州師專學報》1985年第3期  |
| 44 | 李養正 | 〈《太平經》中的音樂理論〉              | 《道協會刊》1985年第7期  |
| 45 | 李養正 | 〈《太平經》中的醫學理論〉              | 《道協會刊》1985年第7期  |

| 序號 | 作者   | 文章名或書名                | 出版資料  |
|----|------|-----------------------|---|
| 46 | 李家彥  | 〈《太平經》的三合相通說〉         | 《宗教學研究》1986年第1期，頁27-31                          |
| 47 | 丁貽莊  | 〈《太平經》中守一淺釋〉          | 《宗教學研究》1986年第2期，頁67-74                          |
| 48 | 陳靜   | 〈《太平經》的承負報應思想〉        | 《宗教學研究》1986年第2期，頁35-39                          |
| 49 | 李家彥  | 〈《太平經》中以十概全的思想〉       | 《宗教學研究》1987年第3期，頁7-9                            |
| 50 | 丁貽莊  | 〈試論《太平經》中的道教醫學思想〉     | 《宗教學研究》1987年第3期，頁1-6                            |
| 51 | 王明   | 〈《太平經》和《抱朴子》在文化史上的價值〉 | 《文史知識》1987年第5期，頁256-62                          |
| 52 | 金春峰  | 〈《太平經》的思想特點及其與道教的關係〉  | 收載於金春峰：《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頁526-58      |
| 53 | 卿希泰  | 〈《天官歷包天太平經》的宗教神學特徵〉   | 收載於卿希泰：《中國道教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一卷，頁85-122    |
| 54 | 卿希泰  | 〈《太平清領經》的來歷及其主要思想〉    | 收載於《中國道教史》，第一卷，頁192-221                         |
| 55 | 李家彥  | 〈《太平經》與《聖經》倫理思想比較〉    | 《宗教學研究》1989年第3-4期，頁1-6                          |
| 56 | 任繼愈編 | 《中國道教史》一編一章三、四節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
| 57 | 石磊   | 〈試論《太平經》中的經濟思想〉       | 《宗教學研究》1990年第3-4期，頁51-56                        |
| 58 | 龔鵬程  | 〈受天神書以興太平〉            | 收載於龔鵬程：《道教新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頁79-262          |
| 59 | 李豐楙  | 〈當前《太平經》研究的成果及展望〉     | 收載於《道教新論》，頁325-34                               |
| 60 | 湯一介  | 〈《太平經》——道教產生的思想準備〉    | 收載於湯一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頁19-76 |
| 61 | 湯一介  | 〈「承負」說與「輪迴」說〉         | 收載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頁361-74                         |

| 序號 | 作者  | 文章名或書名                 | 出版資料  |
|----|-----|------------------------|---|
| 62 | 龔鵬程 | 〈《太平經》政治理論述評〉          | 收載於《第二屆中國政教關係國際學術研究討論會文集》（臺北：淡江大學歷史系，1991年），頁105-32     |
| 63 | 劉仲宇 | 〈《太平經》與《周易參同契》〉        | 收載於牟鐘鑒、胡孚渾、王葆玟（編）：《道教通論——論道家學說》（濟南：濟南出版社，1991年），頁340-71 |
| 64 | 蘇抱陽 | 〈《太平經》成書的幾個問題〉         | 《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4期，頁14-21                                 |
| 65 | 劉昭瑞 | 〈《太平經》與考古發現的東漢鎮墓文〉     | 《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4期，頁111-19                                |
| 66 | 林富士 | 〈試論《太平經》的疾病觀念〉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二本第二分（1993年），頁225-63                 |
| 67 | 連鎖標 | 〈《太平經》易學思想考〉           | 《福建師院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頁41-47                               |
| 68 | 俞理明 | 〈從《太平經》看道教稱謂對佛教稱謂的影響〉  | 《四川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頁55-58                                 |
| 69 | 李剛  | 〈也論《太平經鈔》甲部及其與道教上清派關係〉 | 《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輯（1994年），頁284-99                              |
| 70 | 龍晦  | 〈《太平經注》序〉              | 《道家文化研究》第七輯（1995年），頁165-74                              |
| 71 | 王平  | 《太平經研究》                | 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
| 72 | 劉昭瑞 | 〈「承負說」緣起論〉             | 《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4期，頁100-7                                 |

##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udy of the *Taiping Jing*

(A Summary)

Lai Chi Tim

This paper aims a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scholarship on the *Taiping jing* since 1935. By so doing, the autho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achievement and problematic of their study on this Daoist classic.

This paper will first outline the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Chinese study of the *Taiping jing*. Secondly, it will analyse three major areas of discussion among Chinese scholars about the contents, themes,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book, namely, (1) the form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book; (2) the socio-political thought contained in the book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existing three different literary genres; (3) the religious value system of the book, especially the idea of “inheritance of sins” (承負).

Finally, by detailing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he *Taiping jing* by Chinese scholars, this paper further lays out some of the unexplored areas for the future study of the book.